

古今中西 有容乃大

— 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閻惠昌訪談

彭麗

適逢香港回歸祖國十周年之際，香港中樂團也迎來了三十周歲的紀念日。在中國民族管弦樂藝術領域，這一後起之秀如今已躍居前列，成為目前我國藝術水準穩步發展、樂隊編制最為龐大、擁有委約、委編作品最多的一支優秀民族管弦樂隊。幾十年的不懈努力贏來了各界對中樂團社會形象的廣泛關注。自2001年在香港舉辦的「鼓樂節」、「胡琴節」、「笛簫節」、「古箏節」等大型器樂節以來，香港中樂團在推廣中國音樂文化方面做出了驕人成績，有效地將中樂文化深入到香港市民生活之中；而每年以不同主題推出的數十場系列音樂會，以及社區活動、展覽交流等，不僅豐富、提升了香港的都市文化品位，影響了社會文化的流向，其培養大批擁躉的社會、文化功效更是意義深遠。回歸以來，中樂團作為「香港文化大使」頻繁的外訪演出更提升了它在國際樂壇的知名度。

近期，我在香港參加「第四屆中樂國際研討會」期間，採訪了香港中樂團的藝術總監閻惠昌先生。這是一位精力充沛、工作熱情高漲、有著「大抱負」的藝術家。侃侃而談中，他對於民族藝術的廣闊視野、對於音樂創作的精闢觀點，以及對於香港中樂團目前定位與發展方向的清晰把握，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彭：在香港中樂團發展的30年歷程中，您與它攜手度過了10年風雨。在這期間您認為樂團發生了哪些顯著的變化？

閻：香港中樂團成立於1977年，在歷任音樂總監的努力下，中樂團有著良好的發展趨勢。97年初我作為第4任總監來到中樂團，適逢香港回歸在即，社會文化意識流向正發生著變化：從港英政府時期的殖民文化，轉變為對中國文化的廣泛認同，這給樂團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和良好的環境。

在我任職的十年間，遇到的最大變化就是樂團改制。啟用「公司化」管理，這使樂團進入發展的新階段。每一位團員從自己的思想深處，對這份工作的認識發生了較大變化。公司化初期，理事會制定了樂團的使命宣言，明確了樂團的發展目標，經過一段

改制準備期的廣泛交流，團員在思想上被動變為主動，有了與之共同奮鬥的目標和願望，開始主動為樂團使命而奮鬥，逐漸形成了可貴的團隊精神。

在港英政府統轄階段，樂團主要的職責就是定期推出高水準音樂會，豐富香港地方的雅文化氛圍。當時藝術上的基本方向是以傳承中華文化為主。現今我們在藝術視野的擴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們的音樂不僅傳承中華文化，還要體現本土情懷，體現現代文化，甚至展現世界文化風貌。在我們每月的音樂會中，都有不同音樂風格的新作品推出。2003年，我們肩負起了「香港文化大使」的光榮職責，進一步將中樂和中國文化推向全世界。同時，要為實現我們的使命宣言，邁向世界級樂團而努力。

彭：公司化之後，對於樂團藝術品質上有無影響？

閻：對於表演團體而言，多在重視演奏家個人技術的提升。為了提高樂團的整體表現力，我來到樂團之後，首先開始實行分聲部訓練。這是受到民樂大師彭修文訓練中國廣播民族樂團方法的影響。樂團的整體音響效果有很大提高。我始終堅信，眾人的智慧才是大智慧。公司化之後，我著重在樂團的藝術架構方面作了調整，設立了四位聲部長，兩位助理指揮。他們除了要統一自己聲部的弓法、指法，及作為獨奏演員等工作以外，還要負責大聲部的訓練與演出。這些既讓他們可以訓練其下轄團員，又給他們足夠的空間來施展其領導才能。例如在外訪演出期間，也要由各聲部藝術領導實施管理者的職責，這也使得藝術部門與行政部門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此外，樂團還設立了藝術小組，由我直接負責，成員包括團長、副團長、聲部長、樂團的研究員、助理指揮、行政總監，共同探討藝術及團隊的合作事項，如對每場音樂會進行綜合考察，參閱首席的評估報告，對每場音樂會進行全面評估，這樣可以及時檢討樂團的成就與不足。

幾年來，我們廣邀著名指揮家和藝術家與樂團合作，來開闊樂師的藝術視野，不斷豐富演奏技術與經驗；樂團內部設立「增值坊」，請各方面專家來團講學，提高樂師的藝術素養，增加樂團的文化厚度。

為了加強藝術上的前瞻性，我們設立了樂團的研究部門，其職責是在學術上審視其他樂團的發展動向，搜集資料，進行樂器改革，給樂團今後的發展提出建設性意見。如樂器改革研究小組，就要及時搜尋、掌握樂改新成果，結合樂團實際情況，向藝術總監提出使用建議。

藝術部門與行政領導要密切配合。樂團公司化以後，我們的理事會作了許多積極的工作。理事會成員多有豐富的管理經驗，以各自擅長的領域對團員予以培訓，強化團隊精神。在行政方面，樂團設立了常規性的檢討機制。如對音樂會的回顧，設計具體表格，由副聲部長以上的團員給各層面打分，及時總結，克服問題。有時樂師分組討論，研習藝術問題，縱向檢討自己，如將近期與以前音樂會相比；橫向觀察周圍，對我們樂團所處的位置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雖然樂團的分聲部訓練極為重要，是提高樂團藝術水準的重要途徑之一，但對於將目標定在世界級的一個專業樂團，其高超的個人技術及深厚的音樂與文化修養、良好的合作默契以及在有限的時間高效率的排練才是終極目的。我們希望未來樂團只要用極少數的幾節排練即可完成一套全新的高難度、高品質的音樂會。去年音樂季我們共推出 37 套 69 場不同形式與主題的音樂會，122 場外展演出，13 場外訪音樂會，和完成了兩個專題器樂節：第四屆香港鼓樂節及香港古箏節。

彭：香港是一個殖民色彩濃郁的現代化城市，在多元文化環境下，如何發揮中樂團的社會作用？

閻：香港的歷史與地理位置等因素決定了它多元文化並存的特徵，這與內地民族樂團強調各自地域文化特色的做法有著明顯不同。多元文化是香港的特色，而多元化的音樂風格就促成了香港中樂團有格而不拘一格的藝術特色。

中樂團是香港政府資助的唯一職業中樂團，為香港市民提供多元化的藝術節目是我們的社會責任和使命。雖然樂團的定位主要是高雅的、專業的，但我們深信：「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我們願意以自己的專業精神，帶領更多觀眾走近中國文化。為此，我們舉辦了一系列大型器樂節，希望通過與民眾的互動參與，讓香港市民親身體會中國音樂文化之美，讓中國音樂文化成為民眾生活的一部分。

中樂團也非常注意為本港作曲家搭建展示藝術作品的平台，委約並演奏了許多本港音樂家的新作品。

彭：今年的研討會已經是自 1997 年以來，中樂團主辦的第四屆中樂學術研討會，這似乎並不是一個音樂表演團體應盡的本分。從目前的發展態勢來看，中樂團的社會功能呈現出多元化的特徵。您如何看待這一樂團定位？

閻：香港中樂團自成立以來，始終以推廣中國音樂文化為己任。隨著資訊時代的到來，社會在不斷的轉型。原先我們在藝術發展方向上那種單線條的思維方式已經不能夠適應當今世界的瞬息變化，需要全方位的發展和嘗試。所以，我們進行了教育系列的推展活動，到學校和社區會堂舉辦音樂會，以小組的形式向青少年、向社會各界介紹中樂樂器和樂曲，策劃出版了《中樂因您更動聽》一書，多管道進行普及中樂的教育活動。2003 年，我們相繼成立了兒童中樂團、少年中樂團及樂器班，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

學術研討層面的交流是保持樂團藝術表現力的重要舉措，前沿的學術觀點往往會引領樂團的藝術實踐更科學、更快速地向前發展。為此，截至目前我們已舉辦了四屆學術研討會，許多有關中樂的問題會在交流中釐清，或得到有益的啟發；研討會後論文集的出版也會給學術界帶來具有實踐價值的參考。儘管這些都是與謀求公司利潤相悖的，但卻從另一個方面指導著樂團的生存與發展。

彭：作為藝術總監，「藝術至上」的理念應該是無可非議的，您如何平衡樂團在藝術水準與社會普及工作之間的關係？

閻：音樂發展的空間是一個「有容乃大」的空間，並不是以一己之見來決定的。在藝術視野方面，藝術總監要有廣闊的世界觀，清晰的自我定位。

正如使命宣言中指出的，體現專業精神和追求音樂至高境界，創建世界一流的中樂團是我們的奮鬥目標。這就要求樂團應當保持穩定的演奏水準，擁有一流的指揮、一流的首席、一流的團員、一流的行政管理……等等。但同時，培養中樂觀眾、普及中樂文化，也是中樂團能夠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因此，我們在中樂的外展活動上作了很多工作。比如，自2001年「香港胡琴節」以來舉辦的各種大型器樂節，每次參與活動的市民都有幾千人。這些活動發揮了很好的社會功能，不僅能夠使參與者切身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與內涵，還可以培養他們對中樂的興趣、愛好，營造更好的中樂文化環境。

彭：中樂團自成立以來已經委約創作或委約改編了近1,700餘首作品，您作為指揮家，如何看待這些作品？

閻：對於作曲家而言，創作個性尤為重要。他不僅要對民族管弦樂隊有所瞭解，還要標新立異，既能讓觀眾接受，又能得到專家的肯定。我們樂團委約的作曲家主要有幾類：老一輩作曲家群體，如彭修文、劉文金、秦鵬章、顧冠仁等，他們的創作在民族管弦樂發展中起到了開創性作用。本港作曲家林樂培的作品曾給了我們在演奏技術方面極大的提高。趙季平、程大兆、景建樹、張式業等人的作品民族底蘊濃厚；譚盾、周龍、郭文景等人的作品，在現代技法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結合方面更為突出；本港作曲家陳永華、曾葉發、郭亨基，以及年輕作曲家陳明志、梅廣釗等人的作品，也都有著鮮明的個性，技術與民族文化的結合別具一格。此外，我們還委約了幾位外國作曲家為中樂團寫作。這些不同的個性、技法、風格，帶給中樂團豐富的藝術體驗。

民族管弦樂配器是中樂創作的重要環節，但至今缺乏總結，更沒有將其中優秀的部分應用於專業教學。比如，彭大師（彭修文）、林大師（林樂培）的配器手法就值得我們很好地進行專門性研究，他們的很多作品是應當納入專業教育的配器教材的。

彭：作為藝術總監，您目前所面臨的最大困難是什麼？今後樂團的目標是什麼？

閻：其實做每一件事情都會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難，關鍵在於應對困難的態度和方法。我覺得，對於人的管理，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最複雜的。樂團公司化以後，我們十分強調團隊精神。新團員到來時，要有5分鐘的個人技術展示，通過個人的藝術才能來確定你在樂團的位置，而不需要團員之間、與上級拉關係。我認為目前團員之間的關係良好。

如果說到最大的困難，我想莫過於超越自己，超越現在所取得的成績。

至於樂團今後的目標，我想，除了不斷實現既定的使命宣言，將中樂團造就成世界級樂團外，還要全方位的發展，而且發展空間很大。比如，我們設想能夠在不遠的將來，建立「中樂資源中心」，將中樂團幾十年的藝術積累與世界共用。今後我們還會有計劃地與內地各省份不同的民族民間音樂團體加強合作，在今日飛速發展變化的時代，我們不但要在藝術上不斷追求創新的同時，要更加有意識的學習、把握、推廣我們中華音樂文化中深厚優良的傳統，讓我們的演奏家、學子、市民通過豐富多彩的音樂會，領略傳統的魅力，吸取傳統給與我們的智慧。

子曰：「三十而立」。在前後四位音樂總監的共同努力下，香港中樂團由最初的業餘團體逐漸發展到今天在華人世界裡的突出地位，其卅載歷程可圈可點。今天，作為一個職業音樂表演團體，中樂團在香港社會文化生活中所釋放出的巨大能量，為本地乃至世界華人民族音樂文化所做出的貢獻，也同樣是有目共睹的。對於所取得的這些成就，作為樂團靈魂的藝術總監功不可沒。這不僅因為其人的審美趣味、價值取向直接決定了樂團的發展方向，而且促成這些的深層原因——背靠華夏文化的歷史積澱與民族民間音樂教育的薰陶同樣不可或缺。閻惠昌總監也因為在推廣中樂方面的傑出貢獻，而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銅紫荊星章。他領導下的香港中樂團所取得的諸多藝術成就、樂團的基本構架、公司化的管理體制以及委約創作的良性迴圈等，也應該成為多數民族音樂表演團體在新時期裡獲得發展的重要借鏡。

傳承與流變

—— 第四屆中樂國際研討會紀實

彭麗、安寧

十月的香港，酷暑盡去。

由香港中樂團主辦的「第四屆中樂國際研討會」於 2007 年 10 月 14 至 15 日在維多利亞灣畔召開。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台灣、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和地區的近 50 餘位作曲家、學者們匯聚一堂，共同就當代民族管弦樂事業的傳承、發展、流變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交流與探討。

今年恰逢香港中樂團成立三十周年，本次研討會的序幕便由 13 日晚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行的中樂團專場誌慶音樂會開啟。

這是一場不同尋常的音樂會。象徵中國古文化的「史前陶樂器展演」與代表民間文化的「陝西華陰老腔」奏響在文化中心大堂臨時搭建的舞台上。置身於現代都市的觀眾們穿梭其間，駐足聆聽與各行其是者皆有，仿若一幅現代版的《清明上河圖》一隅，別有情趣。

稍事小憩，步入音樂廳的人們將親歷名為「古今中西 都會交響」的音樂大宴。不同於以往，音樂會由三節不同主題的作品組成。

上篇《遠古回聲 金聲玉振》。開篇之作便是中樂團委約作曲家程大兆為骨笛、陶埙及敲擊、吹管、彈撥樂而作的《遠古迴響》。分佈於劇場四周的各種獨奏樂器與台上樂隊交相輝映，以全方位的音響聲場，勾畫出一幅天、地、人自然安詳的和諧畫卷。隨後，由河南博物院華夏古樂藝術團的琴瑟和鳴、編鐘樂合奏等形式演繹的《詩經》、《唐曲》、《祭孔音樂》依次亮相。古樸悠揚的樂聲令觀眾穿梭於時空隧道中，盡情領略著中國傳統文化釋放出的無盡魅力。

中篇《南柔北剛 民間樂彩》集中展現了鄉土氣息濃郁的中國民間音樂。主辦方邀請了富有嶺南民間音樂風格的潮州弦絲樂演奏團與散發著黃土高原氣息的陝西華陰老腔藝術團同台獻藝。那「以心帶情、以情奏樂」的潮州弦詩優雅、溫和的演奏，與熱情豪爽、狂放激昂的西北老腔音調，分明是華夏大地上純樸生活的真實再現，卻帶給每一位身處現代都市文化環境下的聽者以極大的震撼。

下篇《古今中西 都會交響》的曲目是香港作曲家陳永華的《八駿》、內地作曲家程大兆的《樂隊協奏曲 — 為香港中樂團建團三十周年而作》，由閻惠昌執棒香港中樂團共同將音樂會推至高潮。前者是中樂團 2006 年的委約之作，作曲家題名《八駿》，意喻香港作為一個現代化大都會所展露的令世人矚目的魅力；後者以多樂章套曲結構形式，展示了古老的中國樂器及其色彩斑斕又個性鮮明的音韻，以及整體組合後絢麗而多變的表現力。其間，當編鐘、編磬與象徵西方音樂的管風琴「和鳴」之時，寓意出普世交融與和諧之意。

在隨後兩天的中樂國際研討會期間，與會專家們圍繞中樂的發展歷史、現狀與前景，進行了主題各異的學術性研討。

歷史回溯：大勢所趨

時光已進入新世紀，但樂界對於剛剛過去的 20 世紀的回顧與反思從未間斷。「以史為鑒」始終是諸多音樂理論家從事學術研究的動力與目標。本次研討會亦由「歷史回溯」開始，從大型中樂團的發展看中國傳統樂隊的傳承與流變；透過民族管弦樂與現代都市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關係及與世界不同文化的交融，進行深層次的文化思考。

前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所長喬建中教授在提交的論文《20 世紀的中國器樂藝術》中指出，在百年滄桑的歷史巨變中，幾代音樂家面對中西、古今、雅俗等多重關係，「為 20 世紀的中國音樂文化事業做了兩件彪炳史冊的大事。其一，全面系統地記錄、整理了存活於各民族各地區豐富多彩的傳統音樂遺產，將其公開出版，使之成為中國民族文化的寶典。其二，以中國傳統音樂資源為基底，廣泛吸收、借鑒西方專業音樂的理念、技藝，創造出一種不同於傳統音樂體裁、風格的全新的音樂，如歌曲、合唱、歌劇、舞劇、器樂獨奏、交響曲、協奏曲、民族管弦樂等，從而使 20 世紀中國音樂結構發生了全域性的轉變。」

作為當代民族管弦樂藝術領域的一支勁旅，「三十而立」的香港中樂團取得了令世人稱道的成就，對其歷史的回顧與總結，必會對當下的音樂界有所觸動和啟發。香港資深樂評人周凡夫在《香港中樂團三十年來的發展與影響》中，以中樂團歷史見證人的身份，回顧了樂團的發展歷程，及對香港社會、甚至整個大中華世界的民族音樂發展

所帶來的衝擊及影響。他指出：「樂團在歷任音樂總監帶領下，已演遍亞、澳、歐、美各大洲，以高水準的演出，將民族大樂團此一形式的中國音樂帶到不同文化的國家，發揮了音樂大使的作用，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同時，這些年來，……在中國內地的演出已越來越多，……演出足跡亦已遍及南京、北京、西安、上海、杭州等地，樂團的高水準表演，和專業化的管理，都對中國內地的音樂同行帶來正面的影響。」

山東藝術學院教授彭麗博士也在發言中指出：「20世紀20年代，誕生於上海的大同樂會開創了民族管弦樂這片新的音樂天地，50年代成立於北京的中國廣播民族樂團確立並成就了它廣泛的社會地位，隨著社會的向前發展，這一音樂形式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傳承與流變。烏瞰民族管弦樂藝術在全球華人地區的發展，香港中樂團已然成為一個突出的代表。其諸多成就值得當下音樂界的高度關注並進行學術性研究。」

文化思考：理論家的心得

文化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主任李松在題為《傳統與現代》的發言中強調了現代化發展所帶來的矛盾：人與自然的對立，現代化背景下的同質化，社會的差異、歧視與分化，物質追求過程中的個人道德修養等。解決這種矛盾的路徑有兩點：縱向是求助於傳統，橫向是借鑒世界上一切人類的創造。就音樂文化而言，問題的核心就是現代化背景下的同質化問題。淺層的表現是音樂特色越來越少，深層的是價值判斷的同質化：創作理念、創作觀念的同質化，理論標準、學術標準的同質化，這些都在影響著文化多樣性的發展。而多樣性文化是全人類創造力的源泉，也應該是中華民族、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基礎。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鄭培凱教授在《中國民族音樂的現代化困境》中認為，「文化與藝術的傳承，不是古跡與古董的保存與收藏，是通過一代代人來保護與發揚的。因為是通過人的參與，就一定和參與者的文化審美意識有關。現代中國人的文化審美意識相當混亂，也因攪和古今中外而複雜紛擾，在傳承與吸取民族傳統的過程中都造成困擾。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是個契機。有困境，認識到困境，才有突破，有創新。」

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余少華博士在談及民族管弦樂發展時，認為應將民族管弦樂隊的存在視為一種「選擇」（change）而非進化（evolution）。台南藝術大學音樂學院院長鄭德淵教授對此持有相似觀點，認為不能因此將其它民族器樂合奏形式視為一種「落後」。

文化思考：以作曲家的名義

國際現代音樂協會會長、香港作曲家曾葉發在《應用現代音樂創作與配器手法於大型中樂合奏之探索》一文中，從創作角度出發，強調了民族管弦樂隊的特性，認為在採用西洋創作手法時應顧及這些特性。「在現今芸芸眾多大型中樂創作中，作曲者在追求『發揚中國音樂特色』的前提下，著力於語言或素材上下功夫，尋求突破。較少有著眼於音色及配器法取向中追求。其實在現今廿一世紀全球化環境下，音樂的東西南北交流機會比比皆是，不論東西方的作曲家，他們可以任何管道、媒體或場合發表製作任何取向的作品，若要『發揮中國音樂特色』，可以任何演出模式展現。故此，針對大型中樂合奏創作，在意念及語言上『中國化』（當然有此必要），但卻比不上在音色、音效或織體上來的迫切、當然。」

香港著名作曲家林樂培在發言中回顧了與中樂團的合作，坦言正是與後者的長期合作，催生了他的《秋決》（1978）、《昆蟲世界》（1979）等代表作。客觀地看，林樂培將現代創作技法融入中國傳統民族音響中的做法，更是進一步影響了許多致力於中樂創作的年輕作曲家。有紀念意義的是，包括六首大型民族樂隊交響曲總譜的《林樂培作品集》恰在 15 日的研討會上首發，此舉亦為中樂團 30 周年誌慶獻上了一份賀禮。

中樂團第二任藝術總監、作曲家、指揮家關廼忠在發言中強調：音樂創作被歷史承認、被時間考驗的過程恰如「浪淘沙」；而目前音樂文化的多元化則是十分正常的事實。女子十二樂坊和譚盾的音樂都有存在的必要，因為有不同的市場和需求。同時，一些看似「老生常談」的言論仍有現實意義：文藝作品的源泉來自生活，作曲家要有深厚的生活，深厚的傳統文化的根底，才能不斷創作出好的作品。

日本著名作曲家三木稔在《談亞洲音樂與亞洲樂人的緊密合作與發展》中，以自己的實際體驗介紹了如何將民族樂器應用在創作中，以達到融合不同文化之目的。在發言的最後，面對當下中國經濟生活的不斷繁榮和綜合國力的日益強大，以及全球化逐步加劇的現實，他對中國作曲家提出了忠告，希望「中國能把自己的特色以及在國際間的交流，保留在音樂中。」

著名作曲家趙季平在發言時提到：香港中樂團在三十年歷程中，在幾位藝術總監的共同努力下，成就卓著。其中有兩點令人感動：一是面向大眾，縮短了樂團與聽眾之間的距離。閻惠昌和中樂團的演奏家們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與香港市民融合在一起，使不同年齡層的人們有機會參與演奏，共同感受中國音樂的魅力，真正做到了中國民族器樂的普及。二是將中國的傳統文化、傳統作品推向世界。中樂團走遍五大洲，廣泛宣傳了中國文化的精神，弘揚了中華文化，功不可沒。

樂器改革：冷落並執著

自民族管弦樂隊誕生之日起，樂器改革就伴隨其左右，諸多成功的改革樂器成就了民族管弦樂藝術半個世紀的輝煌。上世紀 50 年代，內地的樂器改革主要以幾個代表性民族管弦樂團為中心。樂團與樂器廠的密切合作某種程度上表露出當時一些「政府行為」的膽識與魄力。至 80 年代，隨著大型民樂隊的基本定型，樂器改革受重視的程度大幅萎縮。目前，內地樂改受到經濟因素的嚴重制約，與樂團的合作幾近停滯，或轉而成為民樂界的一種個人行為，或轉嫁於專業院校，歸以「科研」名下小步伐前進。進入新世紀之時，環顧眾多民族樂團，仍堅持樂改並成果顯著的當屬香港中樂團。

香港中樂團樂器研究改革室主任阮仕春在《胡琴傳統藝術與環保——香港中樂團的「樂改」創意與實踐》中，介紹了中樂團對大型民族管弦樂隊中胡琴系列樂器的改革心得。在保持傳統胡琴獨特音色的同時，由閻惠昌及阮仕春領導的樂改小組採用了更為環保的合成材料替代蟒皮，克服了因蟒皮厚薄不一而影響樂器音色的統一，繼而影響合奏整體效果的難題。改革後的胡琴系列樂器由於音量大、高音的衰減度低而使音質更顯飽滿明亮，合奏的整體感更為理想。現在環保高胡、中胡、革胡等已全面裝備香港中樂團各聲部，形成了既有科研支持又有實踐檢驗的「雙贏」局面。

中國民族管弦樂協會副秘書長高揚介紹了與他人合作研發的新型二胡，其特點是在琴杆處增加了一套可改變千斤位置的裝置，從而達到可以快速準確地轉調的目的。為了克服蟒皮帶來的問題，他們在改革中也採用了與前者相似的思路，並進一步研製出可以調換整個蒙皮機構的系統，能夠在短時間內更換胡琴的蒙皮，以達到對音質、色彩的不同需求。

西安音樂學院民樂系主任周煜國在發言中介紹了該院的樂改成果。與傳統的思路不同，他們以板震取代了傳統胡琴的膜震系統，因此改革後的樂器在音色上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

四川音樂學院院長敖昌群教授也介紹了川音的樂改成果。他們以民族樂器「火不思」和「忽雷」作為民族低音拉弦樂器改革的參考對象，以西洋大提琴的演奏手法為基礎，結合了京胡中聲學結構特有的複合共鳴原理，研製出民族低音樂器「拉忽雷」，該成果榮獲多項國家級認證。

陝西省文化廳副廳長劉寬忍現場演奏了他的新製塤。該樂器一改傳統塤的陶土特色，改由合成材料製成，其最大特點是在不改變音質的前提下，有效提高了塤的硬度。同時，由於合成材料的可塑性突出，還可製造出帶有複音功能的新式塤。

針對陷入低迷的內地樂改現狀，《人民音樂》副主編于慶新直言，民樂的發展應該是一手抓創作，一手抓樂改。一段時間以來，樂器改革的滯後已經嚴重制約了民族器樂的發展。相對於香港中樂團對樂改的重視力度及成果，內地的樂改基本處於各行其是的狀態。此外，余少華博士在民族樂器結構方面也提出了個人見解，認為彈撥樂器在西洋管弦樂隊中沒有位置，弓弦樂器在低音區衰減的原因在於樂器本身與西洋弦樂器的構造不同，這些都值得作進一步的思考。

中樂教育：正在流失的傳統

從某種意義上講，傳統與現代似乎處於矛盾的對立關係中。當我們開始意識到傳統對於現代人的重要性時，往往其流失已導致我們更多的尷尬和追悔莫及的心態。所幸，我們畢竟開始正視傳統，雖然她在我們面前是模糊的、紛雜的。

對於目前內地專業音樂教育現狀，來自諸多音樂院校的與會代表就各地民樂教育現狀、傳統音樂文化的傳承等問題進行了坦誠的交流。

首都師範大學音樂學院院長楊青教授坦言，在音樂教育領域內越來越濃的標準化教育實不足取。演奏方面，學生們練就了高超的技巧，但對於民族韻律的掌握不容樂觀。在創作方面，對技術的強調導致了過分的以自我為中心，從而忽視了對歷史經典名著的深入學習。（語意）對此，西安音樂學院教授饒余燕亦有同感，他認為內地音樂院校似乎都在淡化民族音樂的教育，過於依賴技巧，而對民族傳統則持無所謂的態度；在這方面應該向香港中樂團這種普及民族文化的作法學習，並應大力宣揚之。

香港大學教授、作曲家陳永華提出建議：我們現在的專業教育是否應該反思一下，用什麼樣的教育體制培養一個作曲家，使他能夠寫出理想的中國民族音樂。現在中小學的音樂課有沒有改革的必要——我在香港念小學時唱的民歌就是英國和蘇格蘭的民歌，中國民歌是進了中文大學後才學的。從小學、中學、到大學應該有一些訓練自己音樂文化的相關課程。（語意）

香港中樂團現任藝術總監閻惠昌也有相同的認識。他言及在海外的經歷，感覺到內地音樂院校的教育體制太過西化，教育上傳統的內容越來越少了。他強調香港中樂團在三十而立的時候，應該更加紮根到傳統中去，在演奏中讓每一位市民、演奏員學習、體會到傳統的魅力。為此，他們今後會有計劃地與相關部門合作，介紹內地各省份不同的民族民間音樂，讓香港的中小學、普通市民有機會領略這些文化瑰寶。（語意）

期間，上海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學院、四川音樂學院、西安音樂學院、首都師範大學音樂學院、香港演藝學院、台南藝術大學音樂學院的代表都在「中樂藝術教育論壇」裡介紹與闡述了民族音樂教育的現狀及理解。可以發現，專業院校將民族音樂納入專業行列，不僅是上世紀中國音樂教育曾經的高瞻遠矚之舉，而且在新時期裡更是與弘揚民族文化的呼聲不謀而合。

管理：成功的基石

越來越多的學者專家們已經認識到，現代化的管理體系是保證和維持民族管弦樂團生存與發展的重要前提。

在「中國民族管弦樂的發展及近代藝術管理」論壇裡，中國廣播藝術團副團長艾立群、高雄市國樂團團長林一鳳、台灣國樂團團長林昱廷、新加坡華樂團藝術委員會主席朱添壽、日本華樂團藝術總監助理富島勝則等都做了發言，分別就自己樂團的架構、管理、藝術實踐等內容進行了交流。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專業團體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與管理分不開的，而前進之路上的種種阻礙又多與管理息息相關。

彭麗博士的專題發言《現代大型中樂團藝術管理研究報告——以香港中樂團為例》更是有針對性地將香港中樂團的管理設為自己的解讀目標，通過對該團管理結構及功用的拆解，她認為明確的樂團定位、有效的管理體系和香港獨特的文化環境是促成中樂團取得目前成就的主要原因。同時指出，「民樂職業樂團在中國內地逐漸趨於弱勢而卻在香港大放異彩。曾幾何時，民樂先輩的諸多設想與未能實現的願望，在香港得以付諸實踐並繼承下來。……這不得不令我們進一步思考，我們缺失了什麼？」

百多年來，中國人以自己一貫的勤勞與智慧，不僅將民族音樂在自己手中發揚光大，還促成了大型民族器樂合奏形式的定型並將其推及到世界華人群體中。所以，儘管前進之路上仍有羈絆，但中華傳統恰如這拂面而來的清爽海風，於無聲處，薪火相傳。

華夏樂韻 香江迴響

— 香港中樂團三十周年誌慶活動述評

彭麗

十月的香港，酷暑盡去。

適逢香港回歸祖國十周年之際，香港中樂團也迎來了三十周歲的紀念日。紀念活動便由 12、13 日晚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行的中樂團專場誌慶音樂會開啟。

這是一場不同尋常的音樂會。象徵中國古文化的「史前陶樂器展演」與代表民間文化的「陝西華陰老腔」奏響在文化中心大堂臨時搭建的舞台上。置身於現代都市的觀眾們穿梭其間，駐足聆聽與各行其是者皆有，仿若一幅現代版的《清明上河圖》一隅，別有情趣。

稍後的音樂大宴「古今中西 都會交響」更是由三節不同主題的作品組成。

上篇《遠古迴聲 金聲玉振》。開篇之作便是中樂團委約作曲家程大兆為骨笛、陶埙及敲擊、吹管、彈撥樂而作的《遠古迴響》。分佈於劇場四周的各種獨奏樂器與台上樂隊交相輝映，以全方位的音響聲場，勾畫出一幅天、地、人自然安詳的和諧畫卷。隨後，由河南博物院華夏古樂藝術團的琴瑟和鳴、編鐘樂合奏等形式演繹的《詩經》、《唐曲》、《祭孔音樂》依次亮相。古樸悠揚的樂聲令觀眾穿梭於時空隧道中，盡情領略著中國傳統文化釋放出的無盡魅力。

中篇《南柔北剛 民間樂彩》集中展現了鄉土氣息濃郁的中國民間音樂。主辦方邀請了富有嶺南民間音樂風格的潮州弦絲樂演奏團與散發著黃土高原氣息的陝西華陰老腔藝術團同台獻藝。那「以心帶情、以情奏樂」的潮州弦詩優雅、溫和的演奏，與熱情豪爽、狂放激昂的西北老腔音調，分明是華夏大地上純樸生活的真實再現，卻帶給每一位身處現代都市文化環境下的聽者以極大的震撼。

下篇《古今中西 都會交響》的曲目是香港作曲家陳永華的《八駿》、內地作曲家程大兆的《樂隊協奏曲——為香港中樂團建團三十周年而作》，由閻惠昌執棒香港中樂團共同將音樂會推至高潮。前者是中樂團 2006 年的委約之作，作曲家題名《八駿》，意喻香港作為一個現代化大都會所展露的令世人矚目的魅力；後者以多樂章套曲結構形式，展示了古老的中國樂器及其色彩斑斕又個性鮮明的音韻，以及整體組合後絢麗而多變的表現力。其間，當編鐘、編磬與象徵西方音樂的管風琴「和鳴」之時，寓意出普世交融與和諧之意。

紀念活動的另一組成部分——「第四屆中樂國際研討會」於 2007 年 10 月 14 至 15 日在維多利亞灣畔召開。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台灣、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和地區的近 50 餘位作曲家、學者們匯聚一堂，共同就當代民族管弦樂事業的傳承、發展、流變、教育等問題，透過民族管弦樂與現代都市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關係及與世界不同文化的交融，進行了主題各異、深入而富有成效的交流與探討。

短短的幾天裡，精心策劃、內涵豐富的音樂會與內容廣泛、緊張而充實的研討會將香港中樂團推至台前，成為與會學者談論最多的話題。學者們對中樂團三十年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給與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正如作曲家、首都師範大學音樂學院院長楊青教授所言，如果沒有中樂團，中國的民族管弦樂創作難以達到目前的水準。《人民音樂》副主編于慶新則指出，從指揮、作品、演奏以及藝術管理等方面來看，中樂團走在了中國所有樂團的前面，並已成為當前民族樂團發展的一面旗幟。

20 世紀 20 年代，誕生於上海的大同樂會開創了民族管弦樂這片新的音樂天地，50 年代成立於北京的中國廣播民族樂團確立並成就了它廣泛的社會地位，隨著社會的向前發展，這一民族樂隊形式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傳承與流變。鳥瞰民族管弦樂藝術在全球華人地區的發展，香港中樂團業已成為一個突出的代表。其諸多成就值得當下音樂界的高度關注。

一、不斷提升樂團演奏水準

香港中樂團有著令人稱羨的委約制度，30 年間積累的 1,700 餘首委約委編作品迄今無人能及。這些作品不僅顯示出幾任音樂總監開闊的藝術視野，更形成了中樂團多元化的音樂風格。其實，香港的歷史與地理位置等因素決定了它多元文化並存的特徵，這與內地民族樂團強調各自地域文化特色的做法有著明顯不同。多元文化是香港的特色，而多元化的音樂風格就促成了香港中樂團有格而不拘一格的藝術特色。

相信創建世界一流的樂團是每一個表演團體的夢想與奮鬥目標。這就要求樂團應當保持穩定的演奏水準，擁有一流的指揮、一流的首席、一流的團員以及一流的行政管理。因此，提高並保持樂團的整體表現力是至關重要的環節。在本次研討會上，香港中樂

團的藝術水準得到了與會者的一致讚許。著名作曲家趙季平感言，中樂團出色的演奏令他對民族樂隊有了深入的理解，樂團所給與的啟迪也融入其民族器樂創作中。香港著名作曲家林樂培坦言，正是與中樂團的長期合作，催生了他的《秋決》（1978）、《昆蟲世界》（1979）等代表作。客觀地看，林樂培將現代創作技法融入中國傳統民族音響中的做法，更是進一步影響了許多致力於中樂創作的年輕作曲家。作曲家楊青亦指出，中樂團優秀的演奏，大大豐富了香港本土作曲家的創作空間，其對於民族樂隊的想像力，走在了內地作曲家的前面。

從近年的節目單可以清晰看出，中樂團廣邀著名指揮家和藝術家與樂團合作，來開闊樂師的藝術視野，不斷豐富演奏技術與經驗；而樂團內部設立的「增值坊」，請各方面專家來團講學，更是有效提高了樂師的藝術素養，增加樂團的文化厚度。因為作為優秀的專業樂團，樂師除了擁有高超的演奏技術以外，其深厚的音樂文化修養、與樂師之間良好的合作默契也是成功的關鍵所在。

二、注重表演與科研並舉

今年的研討會已經是自 1997 年以來中樂團主辦的第四屆中樂學術研討會，這似乎並不是一個音樂表演團體應盡的本分。但從目前的發展態勢來看，中樂團已然成為多數音樂家心目中的民族管弦樂藝術的學術中心，從該次研討會的成員結構既可窺見一斑。同時，中樂團的社會功能正呈現出多元化態勢，這也是它不同於其他大多數民樂團體的突出表現。

學術研討層面的交流是保持樂團藝術表現力的重要舉措，前沿的學術觀點往往會引領樂團的藝術實踐更科學、更快速地向前發展。為了加強藝術上的前瞻性，中樂團除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還設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主要在學術上審視其他樂團的發展動向，搜集資料，進行樂器改革，給樂團今後的發展提出建設性意見。

自民族管弦樂隊誕生之日起，樂器改革就伴隨其左右，諸多成功的改革樂器成就了民族管弦樂藝術半個世紀的輝煌。上世紀 50 年代，內地的樂器改革主要以幾個代表性民族管弦樂團體為中心。樂團與樂器廠的密切合作某種程度上表露出當時一些「政府行為」的膽識與魄力。至 80 年代，隨著大型民樂隊的基本定型，樂器改革受重視的程度大幅萎縮。目前，內地樂改受到經濟因素的嚴重制約，與樂團的合作幾近停滯，或轉而成為民樂界的一種個人行為，或轉嫁於專業院校，歸以「科研」名下小步伐前進。進入新世紀之時，環顧眾多民族樂團，仍堅持樂改並成果顯著的當屬香港中樂團。在研討會期間，該樂團的一系列樂器改革成果也著實令與會學者倍加褒獎。

三、強化音樂普及性教育

近年，中樂團在香港本土進行了系列性的教育擴展活動，如到學校和社區會堂舉辦音樂會，以小組的形式向青少年、向社會各界介紹中樂樂器和樂曲，舉辦大型的器樂節等等，並相繼成立了兒童中樂團、少年中樂團及樂器班，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收效顯著。在有效地將中樂文化深入到香港市民生活之中的同時，每年以不同主題推出的數十場系列音樂會，以及社區活動、展覽交流等。回歸以來，中樂團作為「香港文化大使」頻繁的外訪演出更提升了它在國際樂壇的知名度。

在殖民色彩濃郁、多元文化並存的香港，中樂要發展，只憑藉保持較高水準的演奏是不夠的。培養中樂觀眾、普及中樂文化，也應是中樂團能夠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自2001年在香港舉辦的「鼓樂節」、「胡琴節」、「笛簫節」、「古箏節」等大型器樂節以來，中樂團在推廣中國音樂文化方面身體力行，每次均會吸引幾千市民參與，發揮了很好的社會功能，營造良好的中樂文化環境。它不僅能夠使參與者切身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與內涵，豐富、提升了香港的都市文化品位，還可以培養他們對中樂的興趣、愛好，影響了社會文化的流向，其培養大批擁躉的社會、文化功效更是意義深遠。這些舉動贏得了與會學者的廣泛稱讚。作曲家趙季平在發言時提到：中樂團有兩點最令人感動：一是面向大眾，縮短了樂團與聽眾之間的距離；閻惠昌和中樂團的演奏家們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與香港市民融合在一起，使不同年齡層的人們有機會參與演奏，共同感受中國音樂的魅力，真正做到了中國民族器樂的普及。二是將中國的音樂文化推向世界。中樂團走遍五大洲，廣泛宣傳了中國文化的精神，弘揚了中華文化，功不可沒。

四、卓爾不群的藝術管理

越來越多的學者專家們已經認識到，現代化的管理體系是保證和維持民族管弦樂團生存與發展的重要前提。在構建一流樂團的道路上，良好的藝術管理體系與高水準的藝術詮釋同等重要。

在是次論壇中，來自中國內地、台灣、新加坡、日本等樂團的高層管理者，分別就自己樂團的架構、管理、藝術實踐等內容進行了交流。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專業團體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與管理分不開的，而前進之路上的種種阻礙又多與管理息息相關。在題為《現代大型中樂團藝術管理研究報告——以香港中樂團為例》的大會發言中，筆者通過對該團管理結構及功用的拆解，認為中樂團明確的樂團定位、層次鮮明、高效的管理體系、藝術部門與行政領導的密切配合以及香港獨特的文化環境是促成中樂團取得目前成就的主要原因。同時指出，「民樂職業樂團在中國內地逐漸趨於弱勢而卻在香港大放異彩。曾幾何時，民樂先輩的諸多設想與未能實現的願望，在香港得以付諸實踐並繼承下來。……這不得不令我們進一步思考，我們缺失了什麼？」。

子曰：「三十而立」。

在前後四位音樂總監的共同努力下，香港中樂團的卅載歷程可圈可點。自成立以來，中樂團始終以推廣中國音樂文化為己任。2006年的音樂季，香港中樂團共推出37套69場不同形式與主題的音樂會，122場外展演出，13場外訪音樂會，完成了兩個專題器樂節：第四屆香港鼓樂節及香港古箏節。這一驕人的成績對於目前任何其他民族樂團都是望塵莫及的。在中國民族管弦樂藝術領域，這一後起之秀如今已躍居前列，成為目前我國藝術水準穩步發展、樂隊編制最為龐大、擁有委約、委編作品最多的一支優秀民族管弦樂隊。中樂團卓越的演奏不僅啟迪了眾多作曲家的創作，還拓展了他們的藝術想像空間；數量可觀的委約作品在大大豐富了中國民族管弦樂創作的同時，亦成就了當代眾多優秀的樂隊經典之作；各種行之有效的大型器樂節則將中國傳統文化普及開來，並真正做到了深入民眾，其所承載的社會責任已遠遠超過一個表演團體應盡的本分。正如楊青教授所言，本應歸屬高校的民族音樂教育，在後殖民色彩濃重的香港，卻由中樂團這樣的表演團體自覺地承擔並做得如此到位。其實，學術研討又何嘗是樂團的職責？儘管人們都認為前沿性的學術理論將會對藝術實踐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短短卅載，香港中樂團由最初的業餘團體逐漸發展到今天在華人世界裡的突出地位，其作為一個職業音樂表演團體，在香港社會文化生活中所釋放出的巨大能量，為本地乃至世界華人民族音樂文化所做出的貢獻，當成為中國當代音樂史中突出的代表，並載入史冊。香港中樂團所取的諸多藝術成就、樂團的基本構架、公司化的管理體制以及委約創作的良性迴圈等，也應該成為多數民族音樂表演團體在新時期裡獲得發展的重要借鏡。

百多年來，中國人以自己一貫的勤勞與智慧，不僅將民族音樂在自己手中發揚光大，還促成了大型民族器樂合奏形式的定型並將其推及到世界華人群體中。所以，儘管前進之路上仍有羈絆，但中華傳統恰如這拂面而來的清爽海風，於無聲處，薪火相傳。

本文曾刊登於《人民音樂》2007年12期

論文作者簡介

(按姓氏筆劃序)



阮仕春

出身於香港建築設計世家，曾攻讀土木工程。1974年加入香港中樂團為創團樂師，擔任柳琴首席，參與香港中樂團演出超過三千多場，為多間電台及電視台錄製多個專輯及灌錄多張唱片，演奏及講座足跡遍及亞、歐、美、澳各洲。工餘時間則自費進行樂器復原、設計、研究及製作，復原製作了唐制阮咸、曲項琵琶、五弦琵琶、清制秦琴等，其改良之雙共鳴箱柳琴系列及阮咸系列先後獲文化部「科技進步二等獎」（1992年及1996年）及「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1998年）。該兩系列之改良樂器已獲海內外數十中樂團使用。

2003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授「藝術成就獎（音樂）」，同年出任香港中樂團「樂器研究改革主任」。2005年開始研發的環保胡琴系列，包括高胡、二胡、中胡、革胡及低音革胡已在樂團使用。2011年獲民政事務局推薦參加文化部創新獎。

在教育方面，阮氏在香港、台灣及大陸，為其學生提供改良樂器及指導，協助其學生組織了四隊室內樂隊，創建了新的表演模式。

阮氏以復原樂器及改良現代樂器開拓學術研究及表演藝術兩個空間，影響中外音樂及學術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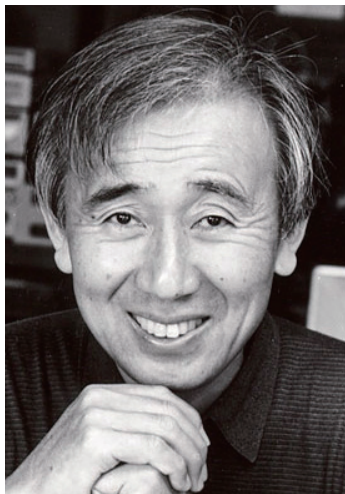


李宏

河南博物院副院長，研究員，華夏古樂團團長。

長期從事文物考古、陳列展覽、古代音樂文化研究的工作。現任兼職中國楚文化研究會副秘書長、中國漢畫學會常務理事。出版專著《漢代畫像石刻藝術研究》和主持編著包括《經典河南·文物卷》、《中原文化大典·玉器卷》、《河南陶塑藝術》、《華夏遺韻——中原古代音樂文物》、《中原古代文明之光》，並以河南博物院和台北歷史博物館兩岸學術合作專案負責人身份，出版《新鄭春秋鄭公大墓青銅器》、《輝縣琉璃閣甲乙二墓》學術專著。在省級以上學術期刊上發表有關文物研究和音樂考古方面的論文數十篇。

2000年組建華夏古樂團，主持華夏古樂研究策劃工作，並與全國古代音樂文化的專家學者一起，帶領華夏古樂團共同策劃赴香港、上海世博會、中國國家大劇院多個古代音樂展演專案，組織策劃多場華夏古樂不同專題的音樂會，並出版相關系列古代音樂的鐳射唱片。



三木稔 (1930 - 2011)

著名作曲家，創作了許多優秀的作品。生於日本德島市，畢業於東京藝術大學作曲系。他積極發展日本器樂體裁，使日本傳統音樂具有現代氣息和生命力。1964年，創立「日本音樂集團」，爭取運用日本傳統樂器，創作新音樂，代表作有《鳳凰三連》、現代箏組曲《箏譚詩集》等。除了作曲，他對箏類樂器改革貢獻非常大，特別是七聲弦制的古箏，影響了幾代人。現在中國彈七聲古箏作品的人也很多。

此外，他還創立了一系列的演出團體，如歌座演出團、結一室內樂團、亞洲樂團、日本室內樂團、亞洲室內樂團等，並擔任這些樂團的藝術總監。

三木氏依據日本的歷史發展，創作有八部歌劇作品：《淨琉璃》、《愛怨》、《源氏物語》、《靜和義經》、兩套室內歌劇《隅田川》及《茸》、《稚姬》、《一個演員的復仇》(An Actor's Revenge)、《春琴抄》。還創作有傳統音樂劇《猴子之詩》等。他創作了大量的管弦樂作品，包括《急之曲》、《馬林巴協奏曲》、《箏協奏曲》、《舞》等。



周凡夫

周凡夫，從事藝文寫作 40 餘年，活躍於中、港、台、澳的知名文化藝術評論人，音樂、文化專欄作家（香港《信報》、澳門《訊報》、台灣《MUZIK》，中國《視聽前線》）。現為香港藝術發展局審批員，香港藝術發展獎 2008 總評審團成員，國際基督教優質中學暨小學校董會董事，新域劇團董事，澳門文化中心藝文寫作工作坊策劃兼主要導師。自 1999 年開始擔任澳門理工學院「音樂鑒賞」課程，及人文學科兼任講師，澳門婆仔屋藝術空間顧問，澳門東亞大學公開學院同學會顧問，澳門藝音兒童合唱團顧問。

周氏於 1984 年參與發起組織香港民族音樂學會，並一直擔任執委會委員；1992 年又參與組織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IATC）香港分會，現為該會創會專業成員、副主席。自 1982 年開始，在香港電台第四台主持多種形式的古典音樂及文化節目。此外，還經常應邀擔任有關音樂文化的專題講座。2011 年 7 月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2005 年 10 月獲頒民政事務局局长嘉許獎章，以表揚其積極推動文化藝術發展的貢獻。2006 年 4 月獲香港特區政府委任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諮詢委員會表演藝術及旅遊小組成員。

周氏曾擔任香港《音樂生活》月刊、及香港《音樂與音響》月刊之音樂編輯，台灣《音樂與音響》月刊主筆，並曾出任香港藝術家聯盟執委會委員、香港文化界聯席會議董事、香港雨果製作有限公司總經理、顧問至今。2003 年出任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顧問。出版著作有《四季集 — 文化澳門十年評論集》、《雪泥鴻爪譜樂緣 — 香港中樂團環球巡演紀實回望》、《律韻芳華 — 費明儀的故事》、《美樂·人生》、《愛與音樂同行 — 香港管弦樂團 30 年》、《傳聰組曲》、《音樂香港評論集》、《香港文化藝術評論集》。



林樂培

林樂培，資深作曲家，香港中樂團資深顧問。1926年生於澳門。是亞洲作曲家同盟（ACL）、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CASH）和香港作曲家聯會（HKCG）的創會理事；把香港引進國際樂壇的開路先鋒。

早年在加拿大、美國及西德研習音樂。1964 - 94年間活躍於香港音樂界，在作曲、教學、指揮、製作電台及電視音樂節目上都有成就。他探索中國新音樂50年，作品以「從傳統中尋根，在前衛技法中找路」為方向，每首作品都有創新痕跡，亦在國際50多個城市發表過，對後起之秀能產生啟發作用。

林氏的作品收藏於香港大學音樂圖書館。2001年之葛羅夫音樂辭典（Grove's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有他的詳盡介紹。



敖昌群

四川省文聯副主席，四川省音協主席，四川省第十屆政協常委，四川省政協文體醫衛委員會副主任。四川音樂學院前院長（2002 - 2010）。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四川省學術與技術帶頭人。中國音協《音樂創作》編委，中國音樂金鐘獎評委，中宣部「五個一工程」評委，中國金唱片評委，中央音樂學院音樂作品比賽評委等。

作品在全國重大比賽中多次獲獎。代表作有：歌曲《我愛你，中華》，《交響序曲 — 紀念》，《生命交響樂》，交響樂《大涼山隨想》、交響樂《羌山風情》、交響樂《康巴音詩》，歌曲《媽媽格桑拉》、歌曲《草原上的格桑拉》，歌曲《遙遠的可可西里》，《第一弦樂四重奏 — 青春年華》；鋼琴與小提琴《b小調奏鳴曲》，舞劇音樂《深宮啼淚》，鋼琴組曲《童年》，民族管弦樂合奏《康巴盛會》等。作品多次在美國、德國、日本、香港等地演出。



喬建中

陝西榆林人，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傳統音樂學會會長；曾任音樂研究所副所長（1985 - 1988）、所長（1988 - 2001）；上海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學院、杭州師範大學、福建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台灣師範大學、台南藝術大學、天津音樂學院、武漢音樂學院、瀋陽音樂學院客座教授；《音樂研究》副主編；《人民音樂》、《音樂藝術》編委；香港中樂團、新加坡華樂團顧問。1992年獲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1997年入載英國劍橋大學《國際名人傳記辭典》第26版。

著有《論漢族民歌近似色彩區的劃分》（1987，與苗晶合著）《土地與歌——傳統音樂文化及其歷史地理研究》（1998年首版；2009年修訂版）、《歎詠百年》（2002）、《中國經典民歌鑒賞指南》（2002）、《中國音樂》（2003）、《國樂今說》（2005）、《樂事文心》（2012）等，編著、主編《中國音樂學經典文獻導讀——傳統音樂卷》（2009）、《中國鑼鼓》（2002）、《中國音樂典藏大系》（1995-1999）、《國樂典藏》（2004）、《音樂學概論》（2004）、《華樂大典·二胡卷》（2010）等辭書、學術文集共14種。



曾葉發

教授、指揮、作曲家。生於香港，是活躍於本地及國際樂壇的現代音樂創作及推廣者。香港作曲家聯會創會主席，1990至1996年期間擔任國際現代音樂協會及亞洲作曲家聯盟副會長，2002年10月獲選為國際現代音樂協會會長，是該會自1923年創會以來首位非歐裔人士會長。曾多次應本地和國際藝術團體的委約創作，合作的團體包括波士頓交響樂團、斯德哥爾摩木管交響樂團、日本民間藝術基金會、香港芭蕾舞團、香港管弦樂團、香港中樂團及香港小交響樂團等。

曾氏曾任多個藝術團體的客席指揮，包括香港管弦樂團、香港中樂團及台北市立中樂團等。他亦是香港小交響樂團的首任音樂總監（1990 - 1993），並曾指揮多個聲樂團，包括香港聖樂團、明儀合唱團及雅樂社合唱團等。

多年來，曾氏曾多次獲獎，包括1988年獲選十大傑出青年、英港藝術基金會藝術家年獎和1990年香港作曲家年獎的得主，2002年更憑《龍形》獲CASH金帆音樂獎最佳正統音樂作品。曾氏是音樂教育家亦是資深的電台工作者，自1979年起於香港電台工作，曾先後出任節目編導、第四台總監及英文台台長等職位，並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演藝學院及英國京士頓大學等高等院校。自2009年起，曾氏出任香港教育學院文化與創意藝術系教授及學生事務長，並致力研究透過嶄新的「樂動」（Creative Musicking）理念推廣音樂創意及表現力至社會每一階層。



彭麗

博士，山東藝術學院教授、音樂學院副院長、碩士生導師，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訪問學者，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中國音樂史學會會員。曾榮獲 2008 年山東省十大「優秀青年知識份子標兵」稱號。

先後於 1998 及 2005 年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系，分別獲得碩士、博士學位。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當代音樂史。長期擔任《中國音樂年鑒》中國民族器樂創作專論的撰稿人。近年來主要關注中國民族管弦樂藝術、山東音樂事業的發展。發表專著《彭修文民族管弦樂藝術研究》（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國韻華章》十卷（合著，人民音樂出版社），以及專業教材 4 本，論文 30 餘篇。主持及完成國家級、省部級課題 4 項，省廳級課題 5 項。科研成果曾獲省部級獎二等獎 3 項，省廳級獎 7 項。



楊青

作曲家。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音樂學院院長。北京音樂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副會長、中國音樂家協會理事及其音樂教育委員會副主任。1970年進湖南省衡陽歌劇團小提琴演奏員。1978年到上海音樂學院學習作曲，師從胡登跳、何占豪、鄧爾博、朱曉谷等先生；1983年於民族理論作曲系畢業，同年起任教於中國音樂學院作曲系，至2002年赴首都師範大學音樂學院任教。

著有《作曲基礎教程》及論文、音樂評論、音樂隨感等。主要音樂作品有：《覓》（揚琴與打擊樂）、《悠遠的回應》（古箏獨奏）、《傾杯樂》（民族室內樂）、《伊人》（室內樂）、《竹影》（民族室內樂）、《瀟湘風情》（民族管弦樂隊）、《雨·竹》（民族管弦樂隊）、《蒼》（笛子與交響樂隊）、《槃》（月琴與交響樂隊）、《北京述說》（交響詩）、《蘭花花》（舞劇音樂）、《白鹿原》（舞劇音樂、與張大龍合作）、《長恨歌》（舞劇音樂）、《伏羲：一畫開天》（舞劇音樂）等數十部作品。影視音樂作品有：《大磨坊》、《國歌》、《雄魂》、《毛澤東和他的兒子》等二十餘部。

楊氏主要音樂作品曾在北京、上海、巴黎、東京、檀香山、新加坡、大邱、香港、台北、高雄等地進行演出，獲得廣泛好評。曾獲中國第六屆音樂作品評選獎（1988）、北京建國四十周年作品徵集獎（1990）、中國「黑龍杯」管弦作曲大賽獎（1993）、台灣「新原人」音樂作品徵集獎（1995）、中國音樂家協會「共和國五十年」優秀作品獎（2000）、台灣「民族音樂創作獎」（2002）、中國音樂家協會「金鐘獎」（2003）、北京慶祝建國55周年文藝作品徵集獎（2004）。



鄭培凱

山東人，1949年隨父母赴台。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於1970年負笈美國，獲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教於紐約州立大學、耶魯大學、佩斯大學、台灣大學、新竹清華大學，現為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教授兼主任。

鄭氏著作甚多，所涉學術範圍甚廣，以明清文化史、藝術思維及文化美學為主。著有《湯顯祖與晚明文化》、《中國歷代茶書匯編（校注本）上下冊》（合編）、《茶飲天地寬：茶文化與茶具的審美境界》、《口傳心授與文化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文獻，現狀與討論》、《陶瓷下西洋研究索引：十二至十五世紀中國陶瓷與中外貿易》及《陶瓷下西洋：十二至十五世紀中國外銷瓷》、《在紐約看電影：電影與中國文化變遷》、《高尚的快樂》、《真理愈辯愈昏》、《樹倒猢猻散之後》、《游於藝：跨文化美食》、《吹笛到天明》、《流觴曲水的感懷》、《茶香與美味的記憶》等三十餘種。



戴路青

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主修樂隊指揮專業。1994 年開始不斷參與許多重要的音樂活動：江蘇音樂舞蹈節、中國藝術節、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上海國際藝術節等，多年裡成功指揮首演了大量的新創作品，並獲得過音樂指揮金獎。

曾指揮的重要音樂會有：「鼓魂」李民雄作品及演奏音樂會；陸春齡從藝 80 周年紀念音樂會；「樂府神韻」民樂名家名曲音樂會；新加坡「笛韻傳奇」音樂會；上海之春「新概念戲曲」作品音樂會等。2000 年與上海交響樂團的合作獲中國《音樂周報》譽為「上海當代極具潛力與才華的新一代青年指揮家」。

戴氏曾擔任「周小燕歌劇中心」小燕合唱團常任指揮、江蘇交響樂團常任指揮，現執教於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並任上海音樂學院民族管弦樂團首席指揮。



富島勝則

日本華樂團藝術總監助理。為畢業於河合鋼琴學校的鋼琴調音師，斯坦威鋼琴演奏調音師協會正式會員。

富島氏自幼開始學習鋼琴。初中、高中時師從荒瀧俊彥學習吹管樂及音樂理論。2000年認識日本華樂團藝術總監龔林，被中國音樂吸引。分別隨松本艷子（Matsumoto Tsuyako）學習二胡，隨龔林學習中國音樂。曾參與日本華樂團往南京、天津、上海世博公演。每年在家鄉日本本州兵庫縣佐用區舉行中國音樂普及音樂會、日中友好音樂會。



15.10.2007



書名	第四屆中樂國際研討會 — 傳承與流變
主編	彭麗
統籌、後期編輯	香港中樂團
出版發行	香港中樂團 香港皇后大道中 345 號上環市政大廈 7 樓 電話：(852)3185 1600 傳真：(852)3185 5615 網址：www.hkco.org
設計、製作	SHERGON Print Asia Limited www.shergonprint.com
版次	2012 年 3 月香港第一版
規格	A4 size: 210mm(w) X 297mm(h)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7321-00-2 © 2012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Published in Hong Kong
